

「澄心堂紙」源起之時代考略

■ 陳建志

第四檔「國寶聚焦」（2020/10/31-2021/1/31）在本院 107 陳列室展陳了宋蔡襄〈書尺牘〉（以下簡稱〈澄心堂帖〉，圖 1）和宋梁楷〈潑墨仙人〉（圖 2）兩件院藏國寶等級的宋代冊頁書畫，展覽初始便陸續接獲來自各方寶貴的批評指教。而「澄心堂紙」始於何時？為眾所關心的焦點之一。今就相關資料整理剖析，同時也希望在文物諮詢服務這一環節上，起到補遺的效用。

「澄心堂紙」源起諸說平議

〈澄心堂帖〉書於癸卯（1063）年的重陽日，為宋四家之一蔡襄（1012-1067）晚年得意之作。內容描述探求紙中名品「澄心堂紙」的經過，同時也透露出內心對於名紙的渴望與講究。關於「澄心堂紙」的源起，眾說紛紜，今依時代先後歸納如下：

一、始於唐代說

張丑（1577-1643，一說 1568-1610）記載唐人褚遂良（597-658）所臨〈蘭亭序〉的材質為「澄心堂紙」，曰：「行書蘭亭序，褚河南臨，澄心堂紙，米元章跋，在海寧陳家，缺三行。」¹由於此本〈臨蘭亭序〉未見傳世，來歷不明，為何張丑稱作「澄心堂紙」？又是如何判斷？目前僅能存疑待考。另外，張進先指出，「澄心堂紙在唐代已經成為歙地歲貢朝廷的珍品，南唐李後主建堂收藏，取名澄心堂紙。」張氏文章非常簡略，文中並沒有看到任何依據或說明，伍伯常則認為持此看法者只是少數。²

二、始於五代說

穆孝天（1915-1996）舉蔡襄「紙，李主澄

心堂為第一，其為出江南池、歙二郡。」和梅堯臣（1002-1060）「永叔新詩笑原父，不將澄心紙寄予。澄心紙出新安郡，臘月敲冰滑有餘。……」二名宋人詩文為例，確信此紙始於五代（907-960），曰：「顯然，五代時澄心堂紙造於今安徽南部的池、歙兩州，早已不成問題了。」³文中亦提及南唐後主李煜（937-978）頂多以其祖李昇（889-943）「澄心堂」來儲藏，並設局令承御監造，李煜招雇四川造紙工人到金陵製做「澄心堂紙」一說證據並不充分。然而，「澄心堂紙」始於五代的理由，未見解釋。令人好奇的是，即便蔡、梅二人所言正確，但安徽池、歙兩州所造紙名，是否一開始即為「澄心堂紙」？亦或只是加工客製化前的半成品？目前尚不得而知。

三、始於南唐說

鮮于樞（1246-1302）曰：「南唐有澄心堂紙，細薄光潤，為一時之甲。」⁴與前述幾人同樣僅見描述，未見說明。雖然包容性較強，但也相對籠統。曹寶麟曰：「澄心堂為南唐後主李煜貯存佳紙之所，其失國之後，藏紙散出，



圖3 唐 懷素 自敘帖 卷 建業文房之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後人得之，往往視作拱璧。」又曰：「蔡襄此帖無疑即是用舊的南唐故物所書。」⁵文中肯定〈澄心堂帖〉即為「澄心堂紙」，並以「南唐故物」稱號。汪常明、陳彪基本上也是抱持同樣看法，曰：「澄心堂紙產於南唐時期，千餘年來受到文人、學者、書畫家、收藏家甚至帝王的高度讚譽，所獲者無不視之為珍寶，歷代仿製不絕。」⁶

四、始於李昇說

李昇，一說本名徐知誥。後晉天福二年（937）更名誥，代吳王自立，即位於金陵（今南京），改元昇元，國號大齊。次年（938）宣布恢復本姓李，名昇，並改國號為唐，史稱南唐。喜好收藏古籍書畫，能詩文書法。⁷院藏唐懷素〈自敘帖〉卷上的「建業文房之印」，據說即為其內府（一說李煜）收藏印記。（圖3）關於「澄心堂紙」的稱號，王壯為（1909-1998）認為與李昇節度金陵時的居室有關，云：「澄心堂是南唐烈祖李昇（昇之誤）節度金陵時之燕居，大約當時黻歛所製御用官紙便以澄心堂為號。」⁸王耀庭則明確指出源自李昇，云：「此紙源於五代南唐烈祖李昇（昇之誤），命宣城加工製作。澄心堂為李昇任金陵節度使住處名稱，據稱其紙，膚如卵膜，堅潔如玉，細薄光潤。」⁹必須注意的是，依王壯為的說法，源起應在徐知誥治理金陵之後（931-），依王耀庭說法則在李昇登基改國號為唐之後（938-），二者開始的時間點並不相同。何炎泉加了「相傳」兩字，曰：「這種紙相傳為五代南唐烈祖李昇命工匠加工製作，表面如卵膜、蠶繭，質地堅潔如玉，細膩光潤。」¹⁰本展展品介紹依循前說，曰：「澄心堂紙相傳為五代南唐烈祖李昇命宣城工匠製作而來，表面猶如卵膜，質地堅潔如玉，細薄光潤。」理由有二，容待後述。

五、始於李煜說

李煜為中主李璟（916-961）和鍾太后所生的皇六子，本名從嘉，建隆二年（961）七月嗣位於金陵，改名煜，是為後主。（圖4）外貌俊逸瀟灑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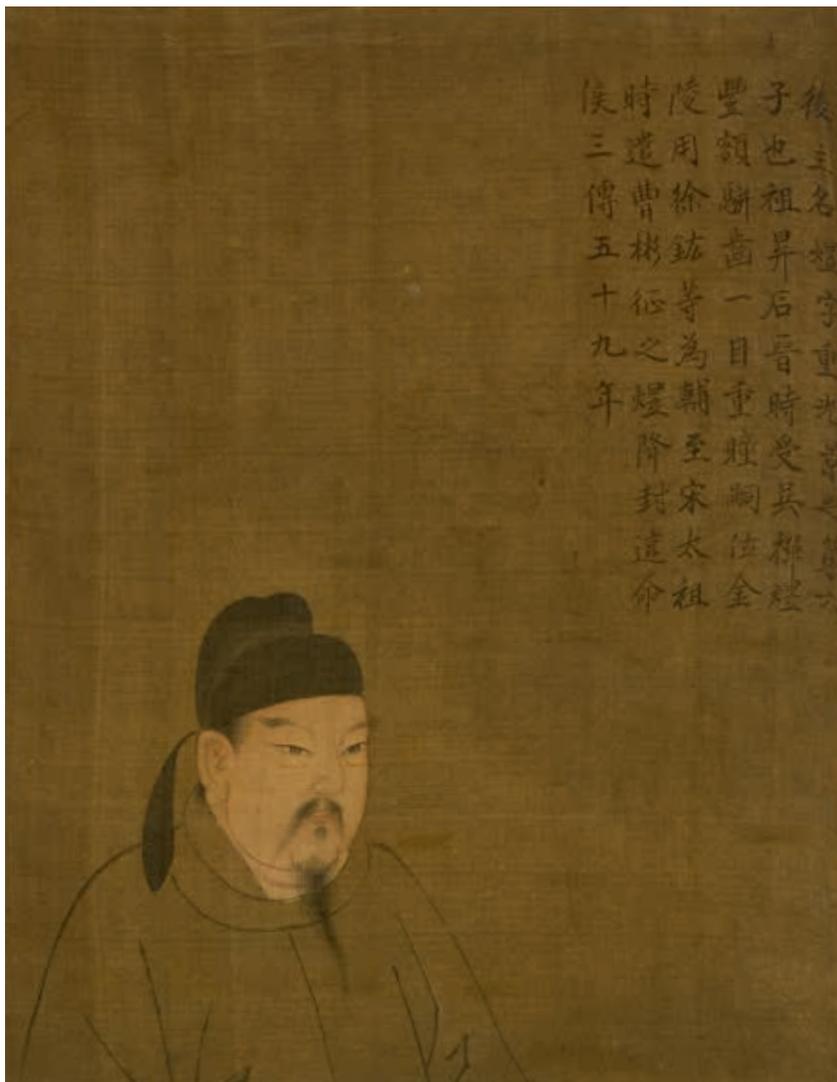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 歷代帝王半身像 冊 南唐後主李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5 五代南唐 趙幹
江行初雪圖 卷 李煜題字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才藝出眾，擅長書畫鑑藏。¹¹ 院藏五代南唐趙幹〈江行初雪圖〉卷起首「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幹狀」題字（圖5），傳為李煜所寫。「澄心堂紙」一詞肇始於李煜的說法最為普及，影響也最廣，以下舉例說明。南宋程大昌（1123-1195）曰：「江南李後主造澄心堂紙，前輩甚貴重之。」¹² 明張岱（1597-1685）曰：「李後主造澄心堂紙，細薄尤潤，為一時之甲。相傳淳化帖皆此紙所拓。

宋諸名公寫字，及李龍眠畫，多用此紙。」¹³ 清人趙宏恩（?-1758）曰：「後主有巧思，製澄心堂紙，時甚珍之。」¹⁴ 近人如金晶發表〈澄心堂紙的源流及技藝傳承考述〉、陳大川〈神秘的澄心堂紙〉也都採用此說。這樣的現象，何炎泉舉出歐陽修（1007-1072）「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，曼卿（石延年，994-1041）為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」、米芾（1051-1108）「李重

光作此種紙，以供澄心堂用」、呂本中（1084-1146）「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后主所製。」三人說法為例，認為「澄心堂紙」的製作者歷來意見顯得比較一致的原因應與北宋文人的認知有關。¹⁵在中國法帖史的流傳方面，也有資料顯示與李煜有關。刻帖之祖《昇元帖》據傳乃以「澄心堂紙」摹搨，楊慎（1488-1559）曰：「南唐升（昇）元帖以匱紙摹搨，李廷珪墨拂之，為絕品。匱紙者，打金箔紙也。其次即用澄心堂紙，蟬翅拂，為第二品。濃墨本為第三品也。」¹⁶至於《昇元帖》和「澄心堂紙」和李煜的關係，林志鈞（1878-1961）曾有論述，曰：「以余所信，則元宗刻保大帖，確有其事；但此帖早已不傳於世。昇元帖後主刻而用烈祖紀元。證以後主造澄心堂紙，亦用烈祖堂名。則刻帖用其祖年號，與其父所刻相繩式，有何不可？」又云：「昇元帖，今所見有故宮藏舊拓本，前有鍾繇、王羲之的像，有董其昌收藏印識。又番禺潘氏海山仙館刻本，卷首有董其昌題昇元帖南唐搨。此二種皆翻刻本。」¹⁷由此可見，林氏亦採「澄心堂紙」始於李煜之說，且《昇元帖》尚在。

「澄心堂紙」編年舉隅

回顧過去研究，可以發現本展在「澄心堂紙」源起的認知上，刻意不用宋人以降，較多人所採納的（五）始於李煜說，而是選擇沿用（四）始於李昇說。除了如前述（二）穆孝天對「澄心堂紙」始於李煜之說已有所懷疑之外，以下舉出二則過去較少受到關注，但卻有年代可考的文獻史料，藉此對「澄心堂紙」這一名稱開始的時代，提供一個新的思路和線索。

一、李璟保大年間（943-957）

南宋名儒周必大（1126-1204）曰：「南唐保大年，澄源禪師無殷住此山，李主甚敬之。

既死，祭以文，時本朝建隆元年（960）也。……歸宿翠巖方丈，觀李主賜無殷詔書，皆用澄心堂紙，每晝日後即押字，印文如絲髮。」¹⁸此處所謂的「保大」，為李璟登基後第一個年號（其後為中興、交泰，同為958年）。依據此一史料，可知李璟即帝位初始，「澄心堂紙」已被取作詔書之用。有趣的是，前述林志鈞論李璟彙刻《保大帖》確有其事，其材質或許即為「澄心堂紙」。

二、李昇昇元二至三年間（938-939）或李璟繼位中主之際（943-958）

姚大榮（1860-1939）對於董源（或稱董元，？～962，一說？～949～？）其人其藝有著精闢獨特的見解，文中也多次談到了董源水墨山水與「澄心堂紙」的關係。姚氏文中推論董源為南唐中主時人，並針對《京口耆舊傳》所載「李後主少時遣人於廬山爽塏地為精舍，極一時林泉之勝，既成，命宮苑使董源以澄心堂紙寫其圖來。」一語的主人公，舉出陸游（1125-1210）〈南唐書元宗紀〉、周必大〈廬山錄〉、周必大〈廬山後錄〉、王象之（1163-1230）撰《輿地紀勝》、黃庭堅（1045-1105）〈開先禪院修造紀〉五則史料，說明劉宰（1167-1240）誤以中主事為後主事，更進一步將此幅董源畫〈廬山圖〉的年代，考訂約莫成立於昇元二至三年之間。¹⁹高弗棠的論調基本上和姚氏相同，曰：「董源為南唐畫家，曾用此紙繪製開先寺風景畫。」又曰：「使董源以澄心堂紙作圖，理應為中主而非後主。」²⁰不同的是，時間較姚氏所考略晚，在李璟繼位中主之際。

小結

「澄心堂紙」始於何時？迄今學界仍未有一個所謂絕對或者是正確的答案。如同「澄心

堂」何時所建、〈澄心堂帖〉本身是否即為「澄心堂紙」一樣，在過去就有兩種以上的說法，可待後續研究繼續討論釐清。一紙詔書、一紙〈廬山圖〉，據載其載體均為「澄心堂紙」，可見「澄心堂紙」於南唐中主李璟在位時即已問世，無需等到後主李煜。據姚氏研究，其下

限甚至可以往前推溯至昇元二至三年之間，也就是徐誥恢復本姓李，改國號為唐之後。

後記

本文承蒙何炎泉博士指導，謹申謝忱。惟一切文責仍由作者承擔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註釋：

1. (明) 張丑，《真蹟日錄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 817，卷 3，〈蘭亭序〉，頁 564。
2. 伍伯常，〈南唐文化與宋代士大夫的品味——以文房四寶為中心〉，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，63 期（2016），頁 57。
3. 穆孝天、李明回，《中國安徽文房四寶》（合肥：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，1983），頁 14-15。
4. (元) 鮮于樞，《紙箋譜》，收入《中國歷代美術輯編匯編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7），冊 16，頁 115。
5. 曹寶麟，〈澄心堂紙帖〉，《中國書法全集·宋遼金編·蔡襄卷》（北京：榮寶齋，1995），卷 32，頁 212。
6. 汪常明、陳彪，〈南唐澄心堂紙考〉，《中國書法》，354 期（2019），頁 94。
7. 陳葆真，〈南唐烈祖的個性與文藝活動〉，《李後主和他的時代——南唐藝術與歷史論文集》（臺北：石頭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 15-45。
8. 王壯為，〈澄心堂紙〉，《書法叢談》（臺北：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，1965），頁 267。查王壯為說法語出陳師道（1053-1101）：「澄心堂，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，世以為元宗書殿，誤矣。」見（宋）陳師道，《後山談叢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 1037，卷 2，頁 72。
9. 王耀庭，〈蔡襄尺牘〉，收入李玉珉、許郭瑛執行編輯，《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5），頁 237。
10. 何炎泉，〈宋蔡襄書尺牘〉，收入余佩瑾主編，《品牌的故事——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7），頁 152。
11. 陳葆真，〈藝術帝王李後主（一）～（三）〉，《李後主和他的時代——南唐藝術與歷史論文集》（臺北：石頭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 111-246。
12. (宋) 程大昌，《演繁露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 852，卷 9，頁 141。
13. (明) 張岱，《夜航船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），冊 1135，卷 8，頁 648。
14. (清) 趙宏恩等監修，《江南通志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 508，卷 30，頁 21-22。
15. 何炎泉，〈澄心堂紙與乾隆皇帝——兼論其對古代箋紙的賞鑑觀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3 卷 1 期（2015 秋），頁 316-317。
16. (明) 楊慎，《墨池瑣錄》，收入嚴一萍續編，《美術叢書·六集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5），輯 5，冊 28，頁 34。
17. 林志鈞，〈南唐刻帖考〉，《帖考》（臺北：華正書局，1985），頁 4。
18. (宋) 周必大，《文忠集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 1148，卷 169，頁 848。
19. 姚大榮，〈董北苑畫法表微〉，收入《東方雜誌》，27 卷 1 期（1930），頁 125-142。所引原文見（宋）劉宰，《京口耆舊傳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 451，卷 1，頁 121。
20. 高第榮，《宣紙古今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20），頁 64-65。